

丁立平 李莉 主编

名人书缘



国防大学出版社

名

人
書
緣

丁立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
生編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书缘/丁立平,李莉主编.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7-5626-1327-3

I. 名… I. ①丁…②李… III. ①名人—读书方法②名人—生平事迹—世界 N. ①G792②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8965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6769235

北京登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21 千字 印数: 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的话

我们长期在图书馆工作，可以说，书、报、刊就如同战士手中的武器，是我们的珍宝。我们常常去甄别哪些书有价值，哪些书价值不大，但一本书对一个人的一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没有具体的答案。有人曾经向孩子的语文教师抱怨说自己的孩子看漫画书太多，影响学习。那位老师却以肯定的口吻说，不要限制，只要是好书，你尽管让她去看，即使是漫画书，也会留给人无限的遐想，让人的思想在书中翱翔。

我们纵观古今中外领袖、将帅、志士、学者，深深的感受到在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上，书给了他们勇气，书给了他们力量，书给了他们智慧。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与书结下了种种情缘。尽管有甜、有苦、有酸、有辣，但他们始终对书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有着难以言表的情怀。

时代的步伐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在这色彩缤纷的世界里，我们以这本书淡淡的墨香，为读者送上一叶小舟，让大家在无尽的书海中荡漾，也让我们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在编著这本书时，我们参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在此，我们对所有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

作者

2004年2月

目 录

图书馆与《资本论》创作之路	
——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的足迹·····	1
拿起每一本新书就像拿起一件武器	
——列宁在革命实践中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13
在异国他乡博览群书	
——孙中山在大不列颠博物院的读书生活·····	29
领袖与文豪的文字缘	
——毛泽东与他一生珍爱的《鲁迅全集》·····	41
红楼图书馆里的灯光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51
展览会上的一份珍贵手稿	
——周恩来同志早期革命斗争的见证·····	61
马背上的军事翻译家	
——刘伯承与他的军事译著·····	78
出身少林的武将也喜欢读书	
——许世友读书生活片断·····	92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叶剑英读书艺术点滴·····	106
为了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身陷囹圄话读书·····	119

-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未记下的一颗星
——淡泊名利的将星孙毅…………… 130
- 将军钟爱的《辞海》
——刘金轩将军对书的情怀…………… 139
- 郭沫若心中产生出来的女神
——一代文豪对书的眷恋…………… 149
- 在逆境中读书求索
——薛暮桥与他的经济学著作…………… 159
- 书把他和毛泽东连在了一起
——田家英与书…………… 168
- 《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本在生命的爱河中诞生
——朱生豪与宋清如的联手巨著…………… 182
- 许国璋和他的《英语》基础教材
——许国璋的英语情怀…………… 193
- 一本《英汉字典》把一对艺术家的心连在一起
——叶浅予与戴爱莲曾有过的的美丽故事…………… 204
- 梨园读书人
——新凤霞四十多年与书的不解之缘…………… 213
- 敢与毛泽东夺书的人
——朱光与毛泽东的一段书缘…………… 226
- 伟大的成功缘于一生的苦读
——揭秘林肯第一件私人财物…………… 233
- 没有书便无法活下去的人
——杰斐逊毕生与书的渊源…………… 248
- 富兰克林的一生似一本印着烫金大字的精美书籍
——他以书来比喻自己的人生之旅…………… 262

十八岁发奋读书的小学生	
—— 斯蒂芬生从书中获得了成功·····	272
一本书引出的战火情缘	
—— 英雄布朗和女作家的爱情故事·····	282
海明威和《老人与海》	
—— 真正的人永不言败·····	293
童话之王的一生是一篇美丽的童话	
—— 安徒生的文学之路·····	302
后 记·····	313

图书馆与《资本论》创作之路

——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的足迹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提起马克思，人们不能不想到恢弘的巨著——《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科学成果，它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著作。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经济理论著作，有《资本论》这样长久的生命力，掌握这样众多的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起过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

打开厚厚的三大卷《资本论》，人们往往对它的严密的结构、透彻的论证和生动的表述惊叹不已。这座宏伟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是马克思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的。为写作《资本论》，马克思呕心沥血地工作了整整40年。为查阅与《资本论》写作有关的资料，图书馆成为马克思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图书馆

1847年12月到次年1月，受共产主义同盟的委托，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撰写了彪炳千古的《共产党宣言》。第二年，欧洲革命爆发，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放下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投身于革命的风暴之中。欧洲革命失败后，在法国的无产阶级受到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法国政府不允许马克思继续留在法国。

1849年8月底，马克思被迫只身抵达伦敦，一个月后他的夫人燕妮和3个孩子才到伦敦与他团聚。在此后30多年的岁月中，马克思一直生活在伦敦。伦敦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故乡。

到伦敦后不久，马克思就重新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活在伦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关系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伦敦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达250万；伦敦凭借其拥有的如英格兰银行和证券交易这样发达的贸易和金融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伦敦是观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演化的最理想的地方。

率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英国在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出现过像配第、斯密和李嘉图这样一批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围绕斯密、李嘉图学说展开的热烈的理论争鸣、由此衍生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学门派，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缩影。50年代初的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

心。在这种理论争鸣和学派林立的气氛中，马克思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住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脉搏。

另一个吸引马克思来到伦敦的原因是伦敦拥有一座全欧洲最大的博物院图书馆。他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因此，从1850年5月起，马克思开始研读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几乎是全欧洲最丰富、最完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这时，马克思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史，而且还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应用经济学，以及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专门学科。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重视图书馆的利用，这是因为马克思深感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虽有一定的研究，但还不够精深，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更是感到不足。这与马克思所学的专业有关。

在中学毕业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中，少年马克思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对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人追求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的人。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马克思选择了法律专业，但他感兴趣的是历史和哲学。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他就经常泡在

大学图书馆里，钻研了堆积如山的法律专业文献，大大超过了正常课程指定的参考书籍，但他并不满足于掌握一些零星的事实原理，他还渴望依靠哲学的帮助，能够真正地吃透这些东西。马克思感到，自己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要求，这就是要全力为哲学研究而奋斗。

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时，提交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并以这篇论文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原本打算在波恩大学担任哲学副教授，并参与创办名为《无神论文库》的刊物，但是，德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上台后，开始迫害进步教师和学者，马克思不得不抛弃留校任教的意愿。青年马克思勇敢地走向社会，投入了反动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

1842年春，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莱茵报》是由新兴资产阶级创办的一份报纸。同年10月，年仅24岁的马克思任该报主编。这时，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按照德国的传统习惯，森林原本是公共所有的，农民可以到森林中去砍伐林木、拾捡枯树枝。但是，到19世纪初，封建地主开始大肆掠夺森林、侵占原先的共有地。陷于贫困中的农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来进行斗争。所谓的“林木盗窃”的诉讼案即由此而生。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出了一个法案，规定未经林木占有者的许可，农民不得采伐林木，否则按盗窃林木惩处。政府要求各省审定通过这一法案。1841年，莱茵省议会会议对这一法案进行了讨论。最后，莱茵省议会不仅决定对砍伐林木者给予严惩，而且还变本加厉，把拾捡枯树枝也当作盗窃林木的行为，同样给予严厉的惩罚。因此，所

谓的“林木盗窃”问题，实质上是剥夺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莱茵报》应该为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辩护。

于是，马克思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对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法案作了抨击。他指出，把农民拾捡枯树枝视为盗窃林木，这是荒谬的；农民拾捡枯树枝是一种合法的占有，绝不是什么盗窃；莱茵省议会通过这类法案，说明议会已沦为地主阶级私人利益的工具。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因此，对这一侵犯贫苦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还不能从经济关系上进行剖析，还只能从法学的角度加以抨击。这件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推动了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推动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动因，就是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需要。当时，马克思在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最初考察中，已经看到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不具有现实性。他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流于种种“实际经验”的做法，主张对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理论论证；他也反对对流行的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著作妄加评判，主张在不断地、深入地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科学批判。为此，马克思迫切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将为他科学地阐述共产主义理论奠定必不可少的前提。

马克思以他的犀利的笔锋猛烈地抨击了普鲁士政府当局和专制统治制度，使得普鲁士政府急忙作出立即禁止《莱茵报》继续出版的决定。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这时，马克思也愿意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致力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此后，他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其中既包括当时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

·李嘉图的著作，又包括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约翰·雷赛姆·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更细致地研读了他的终生挚友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作了详细的笔记。

1847年1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对他这一时期形成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表述。在政治经济学上，《共产党宣言》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揭示了资本同雇佣劳动对立的经济根源，以及这两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根本性质和必然走势；阐述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

如果从1842年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接触经济问题、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起，一直到1883年3月马克思在放着一大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的桌边，坐在安乐椅上逝世时止，他整整用了40年的心血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乍看起来，人们会觉得政治经济学只是一门普通的社会科学，并不一定十分复杂。但是，就是这门政治经济学，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理论基础，范围极其广泛。各国都有许多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而许多人一生只能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并且不一定能够研究得很透彻。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马克思四十年如一日，克服无数难以想像的政治上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困难，去从事这一研究的？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的这句话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

沿着陡峭山路不断攀登

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极其艰辛的脑力劳动。科学上任何领域中一项伟大的发现或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甚至一个萌芽状态的设想，往往需要科学家锲而不舍地连续探索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付出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从1850年5月起，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里，就经常出现马克思的身影。图书馆内不仅有十分丰富的图书和资料，而且这里布置得十分舒适，冬季有取暖设备，夏季有通风设备。马克思只要一走进图书馆，大脑就立刻兴奋起来，一切不愉快的琐事立即烟消云散。1851年6月，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

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至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不可避免的。

无论酷暑严冬，马克思白天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埋头看资料，直到星月当空才离开阅览室，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坚持写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一生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斗争，但自己却往往工作16个小时以上。马克思曾经诙谐地自嘲说，他采用的是1849~1850年英国狗厂主们实行的换班制度，白天去图书馆，夜间写作。他在阅览室读书的时候，总是坐在D行第二号座位。由于他读书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天长日久，他座位下的水泥地上竟被磨去一层，在那里深深地留下了他的

“足迹”。

马克思一刻也离不开图书馆。有一次，图书馆为了修缮房屋，需要闭馆一个星期。马克思失去了一个星期在图书馆从事研究的机会，感到十分可惜。当他由于别的事务要短时离开伦敦的时候，更感到图书馆对他是多么亲切，多么富有吸引力。有一次，他要到德国柏林去。他在安排自己这个行动计划时，写信给柏林的拉萨尔说：“伦敦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虽然我在这个大巢穴里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

马克思非常鄙视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当时流亡到伦敦的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常常聚集在一起，他们高谈阔论，整天忙碌于狂热地空谈革命中。马克思也鄙视那些试图靠从天上掉下的灵感来研究问题的人。他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正是他勤奋钻研、不畏艰险、努力攀登科学顶峰的真实写照。

为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沿着陡峭山路不断攀登，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首先是家庭的不幸，1852年4月，马克思的1岁的小女儿不幸病逝，当时，马克思一家穷得连埋葬女儿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冒雨出去借钱，借得2英镑，买了一口小棺材，才得以安葬。1857年的冬季是英国罕见的严冬，经济上的极端困难使马克思一家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

此外，疾病、死亡也常常朝他袭来。引起马克思的疾病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他拼命地工作，工作时间大大超过了生理限度所致。长期的劳作，使马克思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起：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

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变，医生要我去旅行，但是，第一，经济情况不许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又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不过一星期来已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有时疾病痛得他无法坐着写字，他就躺着继续写。有时他坐在图书馆看书，突然两眼发黑，头痛难忍，胸部闷得慌。他说：“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他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倾注到了书稿上，总是念念不忘书中的一章一节。甚至夜里说梦话时，也提到书的一些章节。1867年4月，马克思对朋友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当时，与马克思经常接触的人们，也无不深情地回忆起那一时期马克思刻不容缓地抓紧时间学习的情景，以及马克思毫不留情地逼他的朋友们学习的情景：学习！学习！这就是马克思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无上命令，就在于他以身作则。这位不停地顽强工作的智者哪怕只是看你一眼，你都会觉得他在命令你学习。

然而，就是凭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崇高信念，凭着对科学事业的坚韧不拔的追求，凭着普鲁米修斯的巨大的牺牲精神，马克思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坚强的毅力从事他的研究工作。

为写作《资本论》辛勤劳作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可谓是精益求精。在1850年之前，他已经研究了欧洲22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他曾向恩格斯透露，准备在两个月之内写完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恩格斯听了马克思的写作计划后很高兴，他早就希望马克思能够尽快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写信向马克思表示祝贺。可是，马克思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部利用电力来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专著。马克思立即停止了写作工作，仔细研究这本刚刚出版的著作。马克思就是这样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新发现的科学理论的。只要他发现有一本他认为需要研究的著作，在没有深入地研究之前，他是不会动笔写自己的著作的。

在正式动笔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图书馆里广泛搜集、鉴别、研究各种文献资料，凡是与他论述的问题有关的资料在没有完全看完以前，他决不动手写作。拉法格回忆说，马克思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花多大的功夫。即使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图书馆去查阅证实。例如，为了写《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工厂法的二十四页文章，马克思竟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而这些蓝皮书，上院和下院的许多议员们只是把它们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根据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他们武器的威力。因此，直到1863年8月到1865年底，马克思才正式开始以《资本